

同家英共事的日子(中)

吴冷西

(六) 再上庐山

整个1960年,我同家英来往不多,因为从年初到年底,我的工作主要在国际方面,家英则集中力量编辑《毛选》第四卷。

1961年,从毛主席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开始,我国实际上进入了调整时期。家英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先去浙江调查人民公社情况,后到广州参加毛主席主持的讨论人民公社问题的会议,并参加起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通称《农业六十条》)。这时,我正随陈毅同志率领的我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关于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

一个偶然的机,使我和家英重上庐山再度合作。

那是我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时回国,去北戴河休假。当时小平同志正在那里主持讨论由薄一波同志负责起草的《工业七十条》,要我也参加听讲。后来中央决定在庐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8月23日至9月16日),我和家英都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先后到了庐山。小平同志预先告诉我,他可能在大会期间率代表团参加朝鲜劳动党的代表大会,由彭真同志代替他主持《工业七十条》的修改工作,要我、田家英、胡绳负责修改,还可请一波同志指派一些秀才参加。我同家英商量此事时,他坦率地说他对工业情况不熟悉,一定要请熟悉情况的同志参加修改。后来同一波同志商量,由他指定原来也参加起草工作的

梅行、马洪、杨波、张沛等同志参加。

家英告诉我,毛主席上山前说过,这次庐山会议要开好,要开成一个心情舒畅的会。主席虽然仍认为上次庐山会议反右没有错,但又说,那次庐山会议本来该继续纠“左”,后来反右,把反“左”冲掉了。高指标、高征购、高分配、共产风比过去更严重。家英说,主席的看法已有相当大的变化,这次可能比上次要好。因为今年以来中央已作了一系列有关调整的决定,这次会议除工业问题外还有财贸、教育等问题要作出调整的决定。

家英和我以及参加修改小组的同志,认真研究会议中各小组提出对《工业七十条》的意见,其中主要有四个问题:(一)对当前工业形势的估计,有些同志不赞成《工业七十条》草案的前言讲工业情况不好的话太多,认为工业形势已走出了“沟底”,开始上升。(二)对草案规定的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有不同意见,认为不能给厂长那么大的管理权,对设立会计师制度也不理解。(三)对草案中强调按劳付酬、奖勤罚懒也有意见,认为应强调政治挂帅,职工收入不能悬殊过大(其实根本不存在“过大”,而是仍搞平均主义,后来叫做“吃大锅饭”)。(四)对草案中只强调群众路线而不强调群众运动有异议,仍然主张强调技术革命和破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

对这四个问题,家英和我请参加起草的同志摆实际情况。他们认为所以制定《七十

条》就是工业管理中存在严重弊端和混乱,情况远比草案前言中所说的要严重得多。有的同志详细谈了工厂中当时实行的党委集体负责制的种种弊端,厂长根本无法指挥和管理生产。听了他们所谈的情况,我和家英商量,这样的重大原则问题要请示小平和彭真同志,他们拿出主意我们才好修改。

于是我们向他们汇报了各组的意见和我们的看法。小平同志听后斩钉截铁地指示:草案已定原则均不能改变,文字修改可以商量。至于工业形势,看来《前言》讲的还不透,可考虑单独写一个指示,明确重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并强调今后三年以调整为中心。彭真同志要我们按小平同志的意见,一面修改《七十条》,一面另行起草中央关于工业问题的指示。家英在回住处的路上对我说,历朝乱世要有一个善断的宰相,当今亦是如此。

小平同志赴朝后,彭真同志主持《工业七十条》(草案)的修改和中央《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的定稿,坚持既定原则。其中仍然强调群众路线,尽量不写“群众运动”,只写“依靠群众”或“发动群众”;仍然强调“按劳分配”,同时也提政治挂帅;强调技术革新,尽量不提“技术革命”,而且强调尊重科学,把它同“破除迷信”并提,指出不能把科学当作迷信来“破”,强调规章制度的相对稳定是保证生产正常运行所必需。特别是《指示》一稿,把问题讲透了,会中主张不多谈当前弊端的意见反而少了。

家英虽不熟悉工业问题,但虚心倾听专家意见,从善如流,见异析疑,反复商榷,终于完成了交托的任务。

家英对形势的估计很有见地。他认为,不能笼统地说现在已到“沟底”(即困难到顶点,而后即为上升)。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已定,计划指标已降低,农村有了《六十条》,工业有了《七十条》,等

等,从这些方面看,形势已向好的方面变化。但是目前粮食供求差额很大,秋收可能减产,明春可能发生饥荒,工业生产秩序混乱,大批工厂停工待料,市场供求差额很大,困难还没有达到顶点,如果工作得不好,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家英特别对农村情况不乐观。他说,现在同1959年相比,过去一些省大讲增产,现在则大喊困难,国家进口几百万吨粮食(这是建国以来没有的)还不够分配,有些省力争中央多调进粮食,一些省则力保少调出粮食。多数省都发生饿死人,情况可能进一步恶化。他谈到农村干部相当普遍不敢讲真话,害怕“一手高指标,一手右倾帽”。他认为,现在困难比第一次庐山会议时更严重,证明那次会议中我们的观点是符合实际的。

依我看,在第二次庐山会议上,家英比之第一次庐山会议时更为成熟,风采不减当年,心情是愉快的。这不仅因为他在草拟《农业六十条》中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而且因为他在《工业七十条》修改中也充分发挥才华,他两年前赞成的以调整为主的方针正逐步实行。家英和我在工作之余,还像上次庐山会议前期那样,游山玩水,特别同胡绳同志(他没有参加上次庐山会议)再一次参观植物园,也同样议论风生,只是这次因乔木同志没有上山,谈锋不如过去强劲就是了。

(七) 七千人大会

庐山会议下来后,家英即为中央讨论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准备文件,我则准备起草原定年底前召开的第二届人大第三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但是,鉴于赫鲁晓夫在10月苏共22大上发起新的反华、反阿尔巴尼亚运动,中央政治局常委当机立断,推迟召开人大会议(后来在1962年3月至4月召开),改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动员全党力

量，加强调整工作。家英和我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转移。

中央常委是在周总理中断出席苏共 22 大而提前离苏回国后，10 月下旬决定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少奇同志在 11 月 5 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根据毛主席和常委的意见，这次会议要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统一全党思想，以便集中力量做好调整工作。政治局要为这次会议准备一个报告。少奇同志指定由陈伯达牵头，我和家英、胡绳参加，负责起草工作报告。我当场同富春、先念、一波和安子文（当时为中央组织部长）等同志商量，从他们主管的部门抽人组成起草班子，初步确定调来梅行、杨波、马洪、廖季立、赵汉、潘静远、张沛等人，后来又请吴波和段云同志帮忙，集中在钓鱼台 8 楼和 15 楼工作。

第二天，小平同志即来钓鱼台 8 楼召开会议，提出起草报告的框架为四部分：（一）形势和任务：农村情况开始好转，工业生产下降基本稳定；应坚持三面红旗，贯彻八字方针，争取三年调整好；（二）关键是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民主集中制，克服分散主义；（三）改进党风，贯彻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加强党内民主；（四）基本经验教训。他要我们先分工起草，然后由陈伯达主持修改。

我们的分工是，我负责第一、二部分，由梅行、杨波、马洪、廖季立、张沛协助；家英负责第三部分，由赵汉、潘静远协助；胡绳负责第四部分。我们起草初稿后，由陈伯达修改，12 月中旬拿出第一稿。

12 月 21 日，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第一稿，富春、先念、一波、谭震林、安子文等参加。会上讨论的意见主要是对第一、二、四这三部分的，认为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15 年超英的口号是

否仍提值得考虑；对集中统一还强调不够，没有把分散主义和种种弊端写得触目惊心；经验教训要根据中央书记处给政治局常委的检查报告加以阐述，而且要联系党的历史教训写。会议对家英起草的党内问题部分意见较少，只提了一些要加强正面阐述，并突出纠正当前不正之风。

上面所说的中央书记处检查报告是小平同志亲自主持起草的，其中讲到这几年的主要错误为：总路线提出后未及时制定具体政策，已决定的政策有些是错误的；计划指标过高，而且多变；不是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全国搞了许多“大办”，这是违反群众路线的“群众运动”；中央权力下放过多，而且级级下放。

第二天，少奇同志看完第一稿后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我、家英和胡绳谈话。少奇同志劈头就说，报告的起草，还是 1959 年庐山会议上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具体意见主要有：（一）过去四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手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大汗，这才能接受教训。（二）这几年的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错误，要求各地、各部门也改正错误，不能自行其是。（三）关于分散主义要列举表现事实，每个省、每个部都要有例子，一个也不能缺，这种现象太多、太普遍了。（四）这几年的错误，同党内过火斗争，特别是 1959 年庐山会议只反“右”不反“左”、后半段否定前半段、会后又在党内普遍进行反右倾斗争，有很大关系，党内民主不够，使许多错误不能及时改正。少奇同志特别嘱咐我们：秀才们不要怕这怕那、束手束脚，要敢讲老实话，讲过头了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少奇同志走后，我和家英议论，上次庐山会议少奇同志就态度鲜明，直到八中全会还想把《会议纪要》下发，可惜终于落空了。这次七千人大会，少奇同志还是这样的胆识，我们可以放心了。我告诉家英，一个星期前在毛主席家里开常委会讨论会议如何开时，毛主席讲到，书记处的检讨承担了这几年错误的责任，而且说没有很好贯彻他的指示，把他当作圣人。其实这几年错误首先应由他负责，因为他是党中央主席，重大决策是他作出或同意的。主席还说，我的错误你们不讲我讲。

家英说，他也有这样的感觉。1961年，毛主席一直抓调查研究，从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开始，一步深一步地纠正“左”的偏向。这一年他的调查材料和起草的文稿都受到毛主席重视和采用。他认为这次开七千人大会，中央常委意见相当融洽。原来小平同志建议中央工作会议为三级（中央、省、地）干部会，后来毛主席建议扩大为四级（增加县级并包括相当于县级的工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人）干部会，还在“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冠以“扩大的”三个字。

家英还认为，少奇同志这次更加强调缺点讲透，而且措词尖锐。我们是做文字工作的，报告是少奇同志做的，我们起草时只能照他说的写，要改由他改。我们两人商定，并征求了胡绳同志的意见，要原原本本地按照少奇同志的意见修改第一稿。

12月25日至26日，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共同主持讨论我们的第二稿。会上提了很多意见，主要的有：（一）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这点报告中要讲清楚，使干部群众有信心，只要我们能改正错误，就必定能够克服困难。（二）批判分散主义还要加强，要把各地方、各部门的分散主义加以分类，强

调其危害性。红旗杂志社和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负责人（指陈伯达、胡绳和我）参加报告的起草，也应写上自己的错误事例。分散主义不克服，只有分权，没有集权，就不成为社会主义了。（三）我们这几年犯的错误，有些同苏联相类似，别人的错误自己也会重犯，这点应引以为训。（四）原来把经验教训单独写一部分，现在的整体结构不合适，应合并到第一部分中去，而且要重写。

家英负责的党的问题部分，一般认为写得较好，只需再加改进即可，即进一步阐述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党内民主的一贯思想，而且要针对当前党内不正之风。

会后，起草班子重新调整，我只负责形势与任务部分修改，其中经验教训由陈伯达重写；第二部分由梅行、马洪、廖季立、杨波等修改，因为他们对分散主义的情况比较熟悉；家英和胡绳修改党的问题部分。

家英在修改中强调了实事求是作风是党性的第一个标准，着重批评了“谁老实谁吃亏”的思想，提倡“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当老实人”。他在阐述群众路线时，特别对那些把群众运动当作实行群众路线的唯一形式，热衷于表面上轰轰烈烈、实际上脱离群众和违反群众利益的所谓“群众运动”，加以严肃的批评。这些后来在大会上，特别是在县委一级干部中反响很热烈。

家英在修改过程中多次同我和胡绳同志谈到，党的问题部分中最关键的是党内民主问题，而党内民主的核心又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说，中央组织部的同志（协助家英起草的同志赵汉、潘静远都是来自中央组织部的）在这方面有许多典型调查材料，有的地方党委作风很不好，但又不宜和盘托出。他认为需要认真研究，根据八大通过的党章，有针对性地拟出党内生活的纪律、守则或要求若干条，便于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支部执行。

1月3日至6日，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又主持会议讨论和修改第三稿。会议是按读一段议一段的方式进行，论述上和文字上的意见很多，有些当场修改，有的指定一位秀才下去修改然后再拿到会上讨论。四天的时间，上下午作业，终于完成。

少奇同志于1月7日将修改好的稿子（后来通称书面报告的第一稿）送毛主席看。他和小平同志本来设想，一俟毛主席看完，认为大致可用，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讨论、修改、通过，然后再向大会报告。

1月10日，小平同志通知我，他昨天晚上同少奇同志、周总理在毛主席家里开了一个小会。毛主席说，报告稿子很长，他还没有看完。不要等他看完，也不等中央政治局通过，索性现在就发给已经到京参加大会的所有同志，征求意见。同时组织一个起草委员会，根据大家意见，再加修改，然后提交政治局，通过后正式作报告。小平同志要我作几处小的文字改动，就交中央办公厅印发给大会讨论。这样，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1月11日就以分头召开小组会的形式开始工作了。

七千人大会开始后，对报告第一稿的讨论，大会各小组和常委指定的起草委员会同时进行。起草委员会由少奇同志主持，共21人，包括常委、政治局委员、各大区书记，我和家英、胡绳都参加了。大会各组的意见也反映到起草委员会中来。大家基本同意报告中三大部分的论述，但也提出许多意见，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起草委员会从1月17日起经过历时一周的热烈讨论，终于完成了修改任务。

起草委员会的讨论集中在分散主义问题，有的认为这个问题强调过分，有的认为举例太多，而且有些与事实有出入。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再三说明：马克思主义讲时间、地点、条件，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

在中央已经提出一系列调整方针、政策之后，关键就在于各级党委贯彻执行，不容许各行其是。目前贯彻全面调整方针的最大障碍是分散主义。至于举例，少奇同志提出，如认为举例不当的可各自拿出恰当的来替换。后来，当主要问题已经基本解决，少奇同志提出举例可以全部删去，因为类似的事例不是一地一部所独有。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和小平同志通力合作，对修改稿的圆满完成发挥了重大作用。

家英和我，对中央常委如此坚持原则的魄力，而又如此循循善诱的耐心，至为敬佩，深受教育。

对于大会和起草委员会中讨论的问题，家英认为成绩可以多讲几条，但四大错误（高指标和瞎指挥，共产风，分散主义倾向和城市人口增加过快过多）不能含糊。他坚决赞成少奇同志提出的目前困难主要（最后定稿时含蓄地写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自己在工作和作风上的错误所引起的。他引证他在过去一年中农村调查的材料来阐明这个道理。

家英对争论最激烈的分散主义问题，深恶痛绝。他指出，一年来中央逐步改正过去的“左”的错误，实行全面调整，但中央的指示仍然贯彻不下去。原因是许多地方和部门对中央指示或各取所需，或阳奉阴违，或用不学习、不传达、不执行的“三不主义”加以抵制。这种分散主义的恶劣倾向，是建国以来所未有，任其发展下去，不但“左”的错误难以纠正，而且党和国家的统一有被破坏和肢解的危险。家英又说起他对毛主席要他读的贾谊《治安策》深有体会。他说，汉高祖刘邦称帝之初，分封诸侯，结果诸王拥兵自重，割据自大，威胁中央政权，以致前有燕王臧荼等四王谋反，后有“七国之乱”，只得大动干戈，讨而平之。他又举唐代边将弄兵为例，自安史之乱起，藩镇跋扈，宦官

专横，以致外患日深，唐室因以衰亡，史足为鉴。家英纵论今古，都是会下同我和其他同志谈的。

起草委员会结束后，我们又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将报告全篇统改一道（起草委员会开会时已边讨论边修改过一道），经毛主席核阅，1月25日政治局会议上正式通过。

1月27日七千人大会全体会议时，少奇同志没有宣读这个报告（亦称报告第二稿），而是把它作为书面报告提交大会讨论。他在全体大会上根据前一天（1月26日）晚上毛主席的建议而通宵草拟的提纲（在大会开始前经毛主席和其他常委传阅同意）作补充讲话。这篇著名的讲话，那实事求是的精神与坦率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那锋利的观点和无可辩驳的论证，全场反应热烈。普遍认为，少奇同志讲的两个“三七开”切中要害，解开了各级干部中长期以来的思想疙瘩。（全文见《刘少奇选集》下卷）

三天之后，1月30日，毛主席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主题是民主集中制，着重讲发扬党内民主，提议大家在北京过春节，开“出气会”。这就掀起了七千人大会后半期的高潮。所谓“出气会”，就是毛主席在大会前半程中觉察各小组内部很不容易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各地委、县委（主要是县委，每县有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大会）对省委很少提意见，于是在1月30日讲话中大讲发扬党内民主，要各省委书记让人讲话，甚至疾言厉色地提出“偏要摸老虎屁股”。从这以后，各小组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坦率、尖锐、紧张而热烈。

家英当时已兼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曾多次同我参加中办派往各组旁听人员汇报会。家英对我说，各小组讲出来的意见，看来还是比较温和的，还不如中央办公厅平时收到的人民来信中说的那样严重和激烈。他深有感触地说，如果不是毛主席亲自号召大

家“出气”，各组中那些批评省委（也有直接批评中央部门的）的意见肯定说不出来，不少省委也难得在这样的场合作这样恳切的自我批评。有的省委书记亲自到县委书记身旁，为自己出过坏主意和作风粗暴而赔礼道歉，双方都感动得流泪。这是全国解放后开得最成功的领导干部交心会。当时有首打油诗传遍各会场：“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皆大欢喜。”

家英根据以上情况又对他主持起草的少奇同志报告的第三部分党内民主问题作了许多修改，内容更加丰满而有针对性。这也就是报告最后定稿中的关于党的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关于加强党性的“八大要求”的由来。

大会结束前，小平同志指定：家英整理毛主席的讲话，我整理少奇同志讲话。由于少奇同志讲话长于用词造句，前后有序，逻辑分明，我几乎全部按照速记稿整理，只有个别文字改动。家英原想把毛主席的讲话按编辑《毛选》的惯例略加调整，但毛主席觉得还是他原来讲话的速记稿更能表现他当时的思想情绪和语言风格，后来家英也是完全按照速记稿整理，尽量少作修改。我们秀才们议论这两个讲话时，有的同志曾提出，少奇同志强调集中，毛主席强调民主，如何理解。家英当时哈哈大笑说，“相得益彰”。他解释少奇同志着重解决中央同各省、部的关系，毛主席着重解决省委同县委的关系，少奇同志解决了前者，毛主席马上抓住解决后者，两者都是全党性的问题。家英的解释，大家都觉得有理。

七千人大会虽然没有完全彻底清理过去三年中的“左”倾错误，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开得这样成功，全党四级干部统一思想，同心协力，带领群众，艰苦奋斗，终于克服重重困难，用不到三年的时间，提前完成全面调整的任务，使全国形势全面好转。

（八）挫折北戴河

七千人大会后不久，家英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湖南农村调查《农业六十条》贯彻的情况，主题是如何恢复农业生产。少奇同志在北京主持政治局常委（毛主席已去南方，周、朱、陈、邓都参加）的2月扩大会议和5月扩大会议（两者均通称“西楼会议”，因都在少奇同志住处旁边的中办西楼会议厅举行），讨论新发现的严重的经济困难（赤字又增加30亿元，农村中饿死人的现象仍然没有停止，日用品供应奇缺，企业关停并转落实不下去，城市人口减不下去），指出当时我国处于类似经济危机的非常时期，并坚决采取非常措施来解决。家英没有参加这些会。

6月底，家英从南方回到北京，打电话约我到他家中去。他首先问我北京两次会议的情况，然后告诉我，他在湖南农村调查时发现农民普遍要求包产到户。近40%已自动实行包产到户或称扩大“口粮田”，其余60%左右还在犹豫观望，做做工作可能仍然搞集体经济或半集体经济。他说，在上海汇报时陈云同志赞成他的看法。回京后，少奇、小平同志听取他的汇报时也认为，在困难的地方，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渡过困难时期），势在必行。

我告诉他，陈云2月26日在国务院扩大会议（副部长级干部参加）工作报告时提出非常时期非常措施，全场多次响起了真正暴风雨般的掌声。对城市居民增加每天配给一大豆（可做半斤豆腐），每月配给半斤鱼，每年配给两双尼龙袜子（当时百货商店中货架空空如也），卖高价糖果回笼货币，反应尤其热烈。家英连声叫好，说陈云同志真有办法，大得人心。

家英说，他正等待毛主席回京，尽快汇报调查的情况。

在这中间，中央办公厅组织了几个调查

组分赴全国各地调查包产到户的情况。尚昆同志和家英同志要人民日报也派人参加，我派几位同志去了，同时也派一个调查组去京郊房山。我还同家英商量，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内部参考刊物，也发表一些有关包产到户的材料。

我派去房山的调查组的报告还没有写出来，家英又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到他家里去。我一进门，家英劈头一句是“大事不好”。他说，他向毛主席汇报包产到户的情况后，毛主席满脸不高兴，当时未置可否，但第二天接连同河南、山东、江西的省委书记谈话，提出中央要作一个关于巩固农村集体经济的决定，并且指定陈伯达负责起草，没有要他参加。

家英对我说，内部参考中不要再登包产到户的材料了，派出去的调查包产到户的调查组要尽快抽回来。我回来后赶紧照办，要去房山的调查组把调查报告重点放在如何巩固集体经济，只附带提及包产到户。

因为这样，8月间北戴河会议时，有人告人民日报的状，说人民日报调查组在房山煽动搞包产到户，我拿出会前印出的调查报告才没有挨批；但毛主席在讲话中还是指出新华社《内部参考》登出了许多包产到户的材料不妥。他说，要登就登赞成和反对两方面的意见，不要只登一方面的意见，把《内部参考》办成谴责小说。但是可以考虑办一个《记者通讯》，允许发表不同意见。

家英的遭遇比我困难得多。他不但不能参加当时在北京起草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巩固集体经济的决定（历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文件的起草工作他都参加，甚至是主要起草人），而且在北戴河会议（7月25日至8月24日是中央工作会议，8月26日至9月23日是十中全会预备会议）期间，在中心组（只有政治局成员和各大区组长以及少数有关同志参加，家英和我都参加了）会上，一开头

就被毛主席点名批评,说他在七千人大会后,不去修改《农业六十条》,反而赞成搞包产到户。

毛主席还再三点名批评邓子恢同志(他从1961年3月即赞成安徽搞“责任田”,后称包产到户,1962年5、6月间又在北京中央党校等单位作报告宣传包产到户的优越性)。邓老在会上作了检讨。家英没有在会上检讨,因为他只在内部向中央负责同志汇报调查情况而已。

家英告诉我,陈伯达现在主持起草决定,神气得很,碰到家英不说话,不打招呼,装作没看见。家英说,陈本人在毛主席没有表态之前,原本也是赞成包产到户的。但此人一贯狡猾,从不在主席面前提出新意见,只有在主席表态之后才顺着说话。

家英告诉我,他原本并不赞成邓老的意见,1961年春在广州起草《农业六十条》时他就反对安徽搞责任田。但今年在湖南调查,去的是毛主席和少奇同志家乡的、政治觉悟向来比较高的生产大队,意外地发现大队干部和社员都要求包产到户,言之成理,并且说一旦渡过困难,还是要恢复集体经济。有些地方搞了包产到户,农业生产的确恢复很快。接触到这些实际情况,他感到群众面对灾荒还是千方百计生产自救,包产到户确实

是可行的,很快见效的。他认为,有领导地搞包产到户,集体经济还可能保留相当一部分,也许可达60%,否则放任自流,让农民自己搞,集体经济可能被搞垮,集体财产损失会更大。他明确表示,现在搞包产到户,是经济困难时期发动农民生产自救的好办法,一旦形势好转,集体经济还是方向。领导艺术是能进能退,退是为了更进一步。家英在会议后期也同我一样被中央指定参加修改关于巩固集体经济的决定草案,但由于陈伯达把持,木已成舟,难于有所作为,始终闷闷不乐。

可以说,北戴河会议是家英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其严重性远远超过1959年的庐山会议。在这以后,据家英告诉我,毛主席便很少找他起草有关农村人民公社以至其他问题的中央文件了。家英曾引用唐代韩愈《进学解》中说的“投闲置散,乃分之宜”,其心情可以想见。他对当时会议讨论的中心问题(阶级、形势、矛盾)沉默不言。有时我提到这些问题向他质疑,他不是摇摇头,就是笑一笑。当我告诉他,经少奇同志和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抓阶级斗争不能影响调整经济,毛主席做结论时表示同意,明确指出调整是第一位工作。他对我连说了两句:“这就好,这就好。”

《抗日战争时代》即将出版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大年的论文集《抗日战争时代》,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论文集收入了刘大年1987年下半年以来所撰写的有关文章13篇。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阐述了“抗日战争时代的鲜明特色或特点,一为中华民族空前觉醒;二为人民力量兴起壮大”的观点,澄清了抗战史研究中的一些模糊认识,驳斥了一些别有用心的奇谈怪论。这些对广大读者进一步认识抗日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具有重要的作用。(王春明)